

# 日本政治史

## 第二卷

〔日〕信夫清三郎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日本政治史

## 第二卷

明治维新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 吕万和 熊达云译

627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日本政治史 II

明治维新

信夫清三郎著

---

根据日本南窗社1978年版译出

## 日本政治史

第二卷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 吕万和 熊达云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18.375 字数 409,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27-0242-1/K·005

定价：5.20 元

## 凡 例

一、本卷叙述方法依第一卷凡例。其中，关于事先声明“为避免烦琐起见，原则上不注明引用资料的出处”这一点，有人批评说这样做是“缺乏诚意”。其实，表明作者对读者是否怀有诚意的，并非注明资料出处，而在于作出索引，因为索引能够帮助读者不断使用此书。注明资料出处，乃出于作学问的良心而为，同对于读者是否怀有诚意并无关系。对此，日本的学者往往把问题搞错。在卷末列出文献目录，虽也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但其本来目的，乃在于说明自己著作的根据，甚至包括了在正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文献。为读者在研究工作上提供文献知识的固有手段，乃是学术情报工作。

二、虽然在上一卷中没有说明，但本书对中国使用了特殊的称呼。在本书中，贯通全卷的“中国”一称，是对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略称。因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大清国时期，故说到国名时略称“清国”。至于泛称清国和中国的时期，或者谈到与国名无关的地区时，则使用“支那”的称呼<sup>①</sup>。过去，日本称邻邦中国为“支那”时，曾有侮蔑的含意，因此在中国都讨厌“支那”一称，然而，本书使用“支那”一称，乃是考虑到已对“中国”一称限定了含义。

三、在德川时期，今天的大阪写作“大坂”，函馆写作“箱馆”。据近代史专家藤本笃《大阪府的历史》（《县史丛书》第27种，山川出版社，1969年，第235—236页）所说，在德川时期的记载中，

---

<sup>①</sup> 根据我国习惯，在多数情况下对“清国”、“支那”仍译作“中国”。

有的也写作“大阪”，但一般都写作“大坂”，至明治初年，则“大坂”和“大阪”混用，官印也有两种；在公文中统一写作“大阪”则是明治十年前后的事。箱馆改称函馆的经过是这样的：明治二年八月，政府把德川时期的“虾夷地”改称“北海道”；九月，东久世通禧作为开拓长官到箱馆赴任，于九月三十日将“箱馆”改称“函馆”（榎本守惠、君尹彦：《北海道的历史》，《县史丛书》第1种，山川出版社，1969年，第117页）。不过，本卷除引用当时文章外，一律统一为“大阪”和“函馆”，“虾夷地”也统一作“北海道”。



本书是我把近代日本政治史作为通史来叙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二卷。本卷的主题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是，为应付西欧的冲击而出现的民族革命与“国民”(nation)的形成。政治史家冈义武在其1962年出版的《近代日本政治史》(第一卷，创文社，第113页)中指出，明治维新中的“巨大的政治变革是以民族革命为其重要侧面的”。我在本书本卷中，则继承了冈的论点，把明治维新作为民族革命及国民形成的过程来加以叙述。本卷所叙述的内容，是继第一卷所述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863年9月30日)公武合体派对尊王攘夷派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先作若干序论性的叙述，然后便从文久三年八月的天诛组之乱谈起，直至明治八年(1875年)十一月《明六杂志》停刊时止。关于明治维新的历史过程，我的基本观点大体如下。

一、朝藩体制<sup>①</sup>(日本历庆应三年<sup>②</sup>十二月——明治二年<sup>③</sup>六月)。

这是从王政复古<sup>④</sup>至奉还版籍<sup>⑤</sup>的过程，也是法律史学者福

---

① 朝藩体制，指朝廷和各藩结成的统治形式。

② 庆应三年，即公元1867年。

③ 明治二年，即公元1869年，以下类推。

④ 王政复古，日本自镰仓幕府以后，由将军掌握政治实权，天皇反受将军控制，而王政复古即指政治实权交还天皇。

⑤ 奉还版籍，指迫使封建领主把领地交还天皇。版即版图，指领地；籍即户籍，指人民。

岛正夫所说的、由代替了幕藩体制的“朝藩体制”进行统治的时期（参见福岛正夫的《地租改正》，《日本历史丛书》第21种，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57页）。幕府虽由于奉还大政<sup>①</sup>和献出江戸城而垮台，但对朝廷的反抗却犹未终止，遂展开了戊辰<sup>②</sup>战争；即使在朝廷的统治之下，作为当时语言中所说的“大权”（朝廷）与“小权”（各藩）之间，仍然存在着对立状态。朝藩体制就是作为大权的朝廷和作为小权的各藩孕育着相互之间的对立而形成的体制，它虽与幕藩体制不同，是以旨在应付西欧的冲击形成能同“万国对峙”的统一国家为基本目标的，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即绝对主义国家。

二、神政<sup>③</sup>绝对主义（日本历明治二年七月——明治四年七月）。

明治二年五月，随着函馆战争<sup>④</sup>的结束，戊辰战争即告结束。在此前后，朝廷召开了东京会议——正式名称为上局<sup>⑤</sup>会议。它一方面使军事政变计划伴随而来，另一方面则根据王土王民的思想，断然决定奉还版籍，以祭政一致<sup>⑥</sup>为原则，建立统一的国家。为祭政一致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的意识形态，乃是国学，而把国学者的活动同朝廷相联系的媒介，则是公卿岩仓具视。把国学作为思想体系的统一国家的出现，便宣告了以天皇为顶点的

---

① 奉还大政，指将政权归还朝廷。1867年11月9日（日本历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将政权“奉还”朝廷。其后，天皇又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幕府，结束了六百八十三年来的武家政治。

② 戊辰，1868年为旧历戊辰年。

③ 神政，即神权政治，指政治统治者又作为神的代表，拥有绝对统治权力的一种统治形式。

④ 函馆战争，1868年10月至1869年5月，以榎本武扬为首的幕府军队占据函馆五棱郭，建立临时政权，对抗官军，终于失败。

⑤ 上局，明治初年掌管立法的议政官中的机构，相当于上院。

⑥ 祭政一致，也称政教合一，指祭祀神灵与国家政治相一致思想和政治形态，即所谓神权政治。

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之所以把日本的绝对主义说成是“神政”，就因为它是祭政一致的“神权政治”(theocracy)，与以“君权神授论”(Divine Right of Kings)<sup>①</sup>为根据的欧洲的绝对主义相比，有其鲜明的特征。当时，最准确地揭示了日本绝对主义这一特征的，是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sup>②</sup>。他对朝廷统治赋予“神权政治”的特征。

三、启蒙绝对主义（日本历明治四年七月——明治八年一月）。

在天皇之下建立了统一国家的朝廷，开始实行有利于同世界各国对峙的富国强兵的国家建设。能够设计富国强兵规划的，已经不是国学者，而是洋学者。明治四年七月，朝廷通过废藩置县<sup>③</sup>最终地废除了藩国制度。之所以将同年同月视作绝对主义由神政绝对主义转向启蒙绝对主义的划分时期的点，是因为以洋学者身份任官职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在此前后广泛参加了筹划富国强兵政策的工作，同时国学者的影响显著下降。启蒙绝对主义，乃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后进的东欧各国为追赶先进的西欧各国，汲取启蒙思想，有志于以西欧化来实现近代化而产生的绝对主义的合理形式。日本的绝对主义动员了启蒙思想家，来编纂法典，制定学制和征兵制，改革地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正可同普鲁士及奥地利等东欧各国启蒙绝对主义进行的改革相媲美。在日本，最典型的代表启蒙绝对主义的政治家是江藤新平<sup>④</sup>，把启蒙绝对主义

① 君权神授论，称君主权力是神所授予的学说。

② 加藤弘之(1836—1916)，原为但马(今兵库县北部)出身的武士，幕府末期任开成所教授，明治维新后任天皇的侍讲。其后，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和枢密顾问官。最初提倡“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后又反对建立民选议会。有《真政大意》、《立宪政体略》、《国体新论》等译著。

③ 废藩置县，1871年，明治政府最后废除藩国制度，取消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将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三府七十二县。

④ 江藤新平(1834—1874)，原为佐贺藩(位于九州西北部)武士，明治维新后任文部大辅、司法卿等职，主张征韩论并建议召开民选议会，下野后在佐贺举兵叛乱，被处死。



加以理论化的思想家则是加藤弘之。明治六年，启蒙思想家组成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出现了启蒙主义时代。

#### 四、立宪绝对主义(日本历明治八年二月——)。

启蒙绝对主义虽然通过西欧化和近代化来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进行能与世界各国相对峙的国家建设，但广大人民在政治上仍然陷于无权状态。如果不把广大人民从政治、社会特权之下解放出来，形成“国民”，那就完成不了能与世界各国对峙的国家建设。形成国民的运动，从两个方面开始。明治五、六年历访欧美各国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试图以宪法和议会为媒介形成国民。明治六年，在“征韩”论争中失败并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和江藤新平四参议<sup>①</sup>，要求自由和民权，提出了形成国民的纲领。形成国民的运动由于佐贺之乱<sup>②</sup>及台湾战争<sup>③</sup>时进时退。但是，明治八年二月，木户和板垣就宪法和议会问题在大阪开会，进行了协商；五月，作为大阪会议的结果，由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这都是重要的划时期事件。这时，在形成国民的运动中掌握主导权的是木户孝允，为木户提供形成国民的理论，并对木户在形成国民过程中的政治力量寄予期望的思想家是福泽谕吉。木户一方面保持绝对主义的“专制”本质，另一方面，则要以建立立宪政体，来使绝对主义适应新的形势。日本的绝对主义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它令人惊奇的对新局势的适应能力。启蒙绝对主义开始过渡到立宪绝对主义。启蒙思想家将《明六杂志》停刊，从而自我结束了启蒙主义的历史作用。

本书叙述的内容，也就在这里结束。关于立宪政体如何建立，国民怎样形成，以及“明治时期的日本”显示出怎样的面貌，则都

---

① 参议，明治初年的官职，位在左、右大臣之下。

② 佐贺之乱，1874年2月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士族发动叛乱，随即被平定。

③ 台湾战争，1874年日本政府以台湾人民杀害琉球漂流者为借口，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是下一卷的主要内容。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对于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已花费了五十多年的时间，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在指导明治维新史研究的远山茂树，把制定学制、征兵制和改革地税视为明治维新的“三大改革”。对于它们的历史意义，他在1969年所著《明治维新》（《国民的历史》第十九卷，文英堂）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

“……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市民革命）的见解，其有力的根据就在于这三大改革。对于不这样看待明治维新的见解——作者也持此立场——来说，最大的难点即在于对这些改革的评价。……换言之，我认为，否定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人，还没有提出能够充分说服对方的史实和理论。”（第62—63页）

远山茂树的诚实的史论，为我经常考虑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食粮。解决关于明治维新历史性质争论的关键，正在于如何评价远山所说的“三大改革”。

河野健二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从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自己著有《法国革命小史》（《岩波新书》第348种，1959年），对于日本历史，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福泽谕吉·永生的思想家》（《讲谈社现代新书》第110种，1967年）。他以观察欧洲革命史的目光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批评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于1966年出版《法国革命与日本》（《日本广播协会丛书》第43种，日本广播出版协会），针对关于明治维新史的争论，提出了最尖锐的看法。河野把法国革命与明治维新加以比较，认为“可以概括地说，法国革命是以民主主义革命为目标而获得成功的，但明治维新则莫如说停留在民族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强调“明治维新只把自己的任务限制在实现民族主义上，这只不过是实现民主主义的前提”。然而，尤其引起我注目的，是他的如下论述：

- 5 “……明治维新决非与民主主义无关。从某种见解看来，除了明治四年至明治七年的短时间外，在此前后的维新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潮流，乃是注重‘舆论公议’的议会主义。”(第198页)

然而，正是在河野认为与民主主义“无关”的明治四年至七年的“短时间”内，政府却实行了远山所说的三大改革，正确说来，加上编纂法典一项，乃是四大改革。河野认为，确认了土地的私人占有的地税改革，乃是打算“破坏和消除封建制度”，因而明治维新和法国革命一样，“在主张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是它的核心”(第161页)。这样，我就不揣冒昧，请问河野，与“民主主义”“无关”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什么呢？

同河野一起对法国革命进行研究的桑原武夫，将明治维新定为根据“要求巩固的独立和大胆地实现近代化的热情”而完成的“后进国家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指出它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并强调“大凡后进国家迅速进行改革时，‘自上而下’是不可避免的”(桑原武夫：《传统与近代》，文艺春秋，1972年，第254、267页)。如果这样的话，在日本“自上而下”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力主体又是什么呢？

所谓“自上而下”进行的、与“民主主义”“无关”的“后进国家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首先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作为欧洲后进国家的东欧各国出现的启蒙绝对主义的改革，接着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在亚洲之一角的后进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由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以普鲁士的启蒙绝对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sup>①</sup>为榜样所提出的改革内容。美国的历史学家汉斯·罗森堡，追溯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自“王朝绝对主义”(dynastic absolutism)向“官僚绝对主义”(bureaucratic absolutism)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1740—1786年在位，提倡以“开明专制”即“启蒙专制”精神进行改革，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由增加国家收入来巩固君主专制制度，扩军备战，加紧对外扩张。



过渡的情景，并描述了在其发展的顶点，斯坦因<sup>①</sup>和哈登堡<sup>②</sup>因受法国革命的冲击而完成了所谓“来自内部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和“来自上面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的过程。(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汉斯·罗森堡著：《官僚政治、贵族政治与专制政治——普鲁士的经验》，Beacon Press, 1966年，第18—19及203页。)日本的西洋史学家成濑治根据所著《世界史的意识 and 理论》(《世界历史丛书》，岩波书店，1977年)中谈到的对世界史的鲜明认识，写成《走向近代欧洲的道路》(《世界的历史》第十五卷，讲谈社，1978年)，在叙述奥地利启蒙绝对君主约瑟夫二世进行改革的一节，曾冠以“王位上的革命家”这个标题，联系其发布解放农民的命令，把他同普鲁士的启蒙绝对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加以比较，指出“约瑟夫的作法确实急进，可以称为‘来自上面的革命’”(第342页)，还探寻其本质，论述启蒙绝对主义，并将其与明治维新加以比较。他说：

“……所谓启蒙绝对主义，在象扶植保护工商业的‘福利国家’政策、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等一切方面，都表现为一个‘监护性国家’。它把人民看做政治上还不成熟的人，而要由‘启蒙的’君主在‘健全的理性’的名义下，对一切事情实行来自上面的权威性的领导与限制。这大概确实是‘为了人民’而进行的统治，但却远远‘不是由人民’进行的统治。

“这个意义上的‘监护性国家’，乍看起来具有‘近代的’因素，但它是君主通过绝对主义体制的合理化，努力于使资产阶级尚未

---

① 斯坦因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 1757—1831)，普鲁士首相(1807—1808)，任内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如解放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等。

② 哈登堡(Hardenberg, 1750—1822)，1810年继斯坦因任普鲁士首相，继续推行改革，曾以苛刻的条件准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建立柏林大学，实行义务兵役制等，改革有利于加强普鲁士的国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极不彻底。



成熟的‘后进’社会迅速实行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并由此产生的‘警察国家’。就这一点来说，它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类似之处。但必须指出，它由于缺乏宪法和议会政治，故与日本相比，就更具有前近代的性质。”（第345—346页）

成濑是把拥有宪法和议会政治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约瑟夫二世的启蒙绝对主义相比较。但是，如果把尚未实行宪法和议会政治而实行了四大改革时的明治维新，与约瑟夫二世的启蒙绝对主义相比较，岂不是更为直接，更能使我们联想到日本的启蒙绝对主义吗？这里，让我们再回到桑原和河野的论点上来。他们两位在共同研究欧洲先进国家法国的启蒙思想及法国的革命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作为欧洲后进国家的东欧各国与此相应的动向呢？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在受到西欧冲击的东欧各后进国家中，作为由西欧化而推进近代化的权力主体的启蒙绝对主义呢？问题的根本就是：没有追溯到十八世纪的东欧各国，把后进国家在西欧的冲击下完成的“后进国家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放在世界史的范围以内加以考察。当然，东欧各国启蒙绝对主义所完成的改革，能否叫做“来自上面的革命”还是个问题。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如本卷第四章所述——因受法国革命的冲击而夭折，这就表明，成濑所形容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不过是子虚乌有罢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同“来自上面的革命”相联系，正在于绝对主义自“王朝绝对主义”过渡到“官僚绝对主义”，强有力的官僚能够灵活地对付法国革命带来的冲击。东欧各国启蒙绝对主义问题，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倒莫如说是为对付西欧的冲击而实现近代化的改革问题。因此，追溯十八世纪的东欧各国，在世界史的范围以内考察“后进国家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意义，严格说来正在于由此面产生了后进国家为对付西欧的冲击而实行近代化的问题。如果象桑原所指出的那样，明治维新的变革“不用说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民族以多么巨大的激励”（桑原，前

引书，第254页)。那么，“激励”后进国家日本，使它完成了明治维新变革的，则是欧洲的后进国家普鲁士——后来是俾斯麦<sup>①</sup>的德国。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完成的明治维新变革，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完成的变革相隔了一个世纪，因而能吸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变革的内容上，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主要还是出于外交和财政上的需要。概括起来说，后进国家的日本，受到欧洲后进国家的“激励”而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亚洲各后进国家在已成为亚洲先进国家的日本的“激励”下，却不是没有实现其变革吗？十八世纪东欧各国和十九世纪日本的“后进国家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都是在启蒙绝对主义成为权力主体的情况下完成的，但作为二十世纪的革命，亚洲各国的革命却没有再次把启蒙绝对主义当作权力的主体。

神山茂夫曾经就国家和帝国主义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使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此后，我在工作中总是考虑如何联系神山的批评来进行。在本卷中，我自己提出的课题之一，就是要对神山的批评中与国家论有关的部分，作出我的回答。神山虽已去世，但搞清这些问题则是我对学术界应尽的义务。在下一卷中，虽然还将继续就国家论作出回答，但也提出帝国主义问题以作为该卷的主要内容之一。

信夫清三郎

1978年5月6日

---

<sup>①</sup> 俾斯麦(Otto Bismarck, 1815—1898)，德国贵族出身的政治家，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后统一德意志，任德意志帝国宰相，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企图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有“铁血宰相”之称。

## 目 录

|            |     |
|------------|-----|
| 凡 例        | 1   |
| 序          | 1   |
| 第一章 王政复古   | 1   |
| 第二章 内乱     | 125 |
| 第三章 神政绝对主义 | 185 |
| 第四章 启蒙绝对主义 | 276 |
| 第五章 立宪绝对主义 | 413 |
| 索 引        | 473 |



长州高杉晋作有当今洛西<sup>①</sup>第一卓识家之名。其主张谓，英法当今以十分强盛之势，注视支那之衰政，欲堂堂正正取胜之。日本现今如欲以此为榜样，则为大谬。盖今日可为我榜样者，乃英法等国方兴未盛之时。其时战争频仍，此之不学，何益之有？此乃名论，亦某之攘夷说也。

——中冈慎太郎：《秘示知己论》  
(1866年)

\*

\*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848年革命在欧洲大陆上把政治革命引向了新的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寻求新阶段的政治革命方向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为纪念产业革命胜利而在伦敦举办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把本不属于欧洲的非基督教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诱入“欧洲协调”体制，第一次使西欧国家秩序发展为一种世界性国家秩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开拓西部直至太平洋沿岸，着手建设一个大国。此时，亚洲也在西欧的冲击下进入了激烈动荡的时代。

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至1860年的亚罗战争（即第

---

<sup>①</sup> 洛西，指京都以西。

二次鸦片战争)，根据所订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在经济上，把中国纳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开拓的世界市场；在政治上，则把中国纳入了西欧国家秩序下的条约体制。1853至1854年美国派遣来到日本的培理的黑船，以及1857至1858年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向幕府强行提出的要求，就是分别以鸦片战争和亚罗战争作为进行威胁的武器，从而把日本诱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西欧国家秩序下的条约体制。然而，日本和中国的相应态度却在许多方面迥然不同。

英国期望，只要把中国纳入条约体制，就能把曼彻斯特<sup>①</sup>的商品大量输入中国的广大市场。但是，它的期待大大落了空。1852年，英国商人米契尔<sup>②</sup>向香港总督乔治·文翰提出报告书，分析了英国棉布在中国市场上滞销的原因。米契尔的报告书曾被长期埋没，但1858年出使中国的额尔金受理了它，在证实米契尔仍然持有此种意见后，即将报告书送达本国。1859年7月，英国政府将米契尔的报告书收入蓝皮书<sup>③</sup>予以发表。早就瞩目于中国问题的马克思，注意到了米契尔报告的内容，于1859年11月写作的论文《对华贸易》中介绍了米契尔报告的要点，同时也转变了自己的中国观。马克思所介绍的米契尔的报告书，指出了英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急剧减少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1850年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75万英镑。”<sup>④</sup>

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

---

① 曼彻斯特(Manchester)，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内，是英国棉纺织业中心。

② 米契尔(W. H. Mitchell)，曾任英国驻广州代办。

③ 蓝皮书，十七世纪以后，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以蓝色封皮而得名，是关于经济和外交的主要官方资料。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文版，第58页。